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萧超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萧超然 著

责任编辑:吴金泉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318 千字

1986 年 4 月第一版 198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统一书号:11209·50 定价:2.25 元

作者简介

萧超然 北京大学教授、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1953 年北大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致力于中共党史、五四文化思想史、中国政治和北大校史的教学与研究,现兼职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论著有《中国革命史稿》、《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北京大学校史》(合著)、《国民革命的兴起》(合著)、《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合著)、《中共党史简明词典》(合编)等。另发表学术论文及译作 40 余篇。

重印题记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自 1986 年 4 月问世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六年。去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本书乔列一等,幸获殊荣,惭怍何似!过去六年,风云变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严峻考验,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同样,学术研究也有了喜人的变化。其间,与本书内容有关的重大学术活动就有:1988 年纪念北京大学成立 90 周年和纪念蔡元培诞辰 120 周年;1989 年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和纪念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199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和纪念胡适诞辰 100 周年等。海内外学人把五四运动、中共创建以及有关北大历史的研究,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明年是北京大学成立的 95 周年,我亟愿借这个有意义的时机,把这本与北大历史关系密切的著述,作一些增删、修订,但限于种种条件,这次只能在原版纸型上作必要的订正,算是重印。在目前学术出版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北大出版社热忱提供这次重印的机会,能将初版中一些比较明显的印刷错误改过来,是令人欣慰和高兴的。在此,谨表深深的谢意。

这次重印,原书的构架、内容基本未动,只改正了印刷上的错误;订正了个别史实;对个别人物的评述,在行文遣词及语气上,作了小的更动,使之更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如此,我也不能说它已无愧于读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尽管这次我对本书作了比较细心和系统的校阅,疏漏仍在所难免,我期待着同行专家、广大读者的热忱批评与指教。

著者 1992 年 3 月

第一章 五四时期以前的北京大学

一 从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 到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又是继承中国古代大学——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历史发展而来。因此,计算北京大学的历史,就不仅要从中国近代 1898 年创办京师大学堂时算起,还应上溯到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历史。

① 季羨林先生曾对笔者说过,北京大学的历史应该从国子监创办算起,还可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冯友兰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文史资料选辑》第 83 辑)一文中说:“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又说:“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季、冯两位先生都认为北京大学的历史不能只是从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创办算起,而应上溯到中国古代的太学。这个认识是相同的。笔者认为,汉朝设太学,经三国魏晋,时断时续,没有一直办下来。到晋代设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经隋、唐、宋、元、明、清六代而不废。它是这几代封建王朝官办的“国立”大学,直到清光绪 24 年(1898)设京师大学堂后,国子监始裁废。因此,说北京大学的历史是直接继承国子学(或国子监)而来,似乎更为确切。往上追溯到汉朝的太学,从渊源的意义来说,也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高等教育,源远流长。根据我国古籍的记载,西周时代就有了大学。《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学即所谓大学也”。不过当时不叫大学,而叫“明堂”或“辟雍”,是把教学和祭礼合在一起的一种机构。后来经过春秋战国,朝代递替,战争频仍,官办的大学被破坏无遗。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对策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建议汉武帝兴办大学。但由于汉武帝锐意武功,乐于征伐,对文化教育无暇过问,董仲舒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到汉成帝时,刘向又建议:“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汉成帝下令在长安城南兴建大学校舍,但没有落成,成帝就下世了。直到新王莽时,“辟雍”才落成。随后刘秀起兵打败王莽后,建立东汉,称光武帝,国号建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乃修建太学”。二十七年后又建“三雍”(指辟雍、明堂、灵台),都是具有大学性质的机构。这以后,经过东汉、三国、魏晋,大学教育时断时续。直至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始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经南北朝,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并设。到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设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太学。唐、宋两代亦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和太学。元代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称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为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兼具有国子学性质。入国子监学习的是举、贡、生、监。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划

① 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1902年),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95页。

② 《汉书·礼乐志》。转引自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47页。

③ 《汉书·礼乐志》。转引自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47页。

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亡国危险。于是一些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鼓吹变法维新,学习西方,兴办学堂,培育人才,以图自强。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嵩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他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1898年初,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几次上书光绪,建议加速筹办京师大学堂。他说:“京师设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同年6月,光绪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在诏书中,他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随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光绪的奏折中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要“草定章程,规模略具,举其要义,凡有四端:一曰宽筹经费,二曰宏建校舍,三曰慎选管学大臣,四曰简派总教习”。7月4日,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

① 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② 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页。

③ 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43页。

④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11页、28页。

大学堂。命令中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材”^④。这样，京师大学堂就创办起来了。于是，由梁启超代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第一个办学章程。章程规定办学方针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还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根据这些方针，设置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普通学科要学的课程有：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以及初等的算学、格致学、地理学和文学、体操等；普通学科各课为全体学生所必学。专门学科要学的课程有：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专门学科各课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学生凡在三十岁以下者，必须认习一门外语，三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修外语。章程还规定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人，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人，总管教学工作。章程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大学堂，以便核考”。这样，京师大学堂就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具有国子监的性质。实际上它是取国子监而代之了。1905年，国子监正式裁废。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直接继承中国古代大学——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历史发展而来，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它是一座历史渊源十分久

①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第133-147页。

② 《大学堂关于呈报各地学校章程、教习姓名与学生数额以便核考的咨文》，1898年。北大档案室藏。

远的古老大学。今天世界上的著名大学如牛津大学,创办于公元1168年,至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巴黎大学创办于1253年,至今有七百多年历史;罗马大学创办于1303年,至今有六百多年历史;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至今有三百多年历史;莫斯科大学创办于1755年,至今有二百多年历史。而北京大学的历史,如果从历史渊源来说,也可以从汉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始设太学算起,或至少可以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始设国子学算起,那么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到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改设国子监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比西方古老的牛津大学的历史早了五百多年,比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历史则早了约一千年。这一事实说明,北京大学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继承和集中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许多国学大师都在这里讲过学。这种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古老的历史地位,无疑是使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因素。

同时,如前所述,北京大学不仅继承和集中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而且它也是中国最早接受近代西方科学文明的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创办既是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结果,也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我国进步革新力量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和官吏中,就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1861年,冯桂芬提出“采西学”,主张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十五岁以下之“颖悟文童”入学,“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这样,“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他要清政府“鉴诸国”,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

富强之术”。这两句话随后便逐渐被概括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公式,成为清廷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1862年清政府为了便于与洋人打交道,下令在总理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选出十人学习英文,聘请洋人为教师,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以后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和东文(日本文)馆。1866年,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此后,同文馆又逐步扩充各种自然科学课程,学生也增加到一百二十人。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它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新式专科学校。1902年,同文馆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是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发起了一个以变法维新相号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实行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办学校做起。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京师大学堂于戊戌百日维新运动中创建。由此可见,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运动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创办就打上了进步的印记。不久,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室顽固派发动政变,百日维新运动流产。举凡各种新政措施大都被取缔,唯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其后清室顽固派尽管百般加强统制,竭力要把大学堂办成一座读经的封建书院。但大学堂中寻求进步与革新的传统却绵延不断。研讨学术、探索真理、学习科学、输入文明的努力,从未止息;爱国思想十分浓郁。这种进步的传统和良好的校风,无疑是使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又一种因素。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是孙家鼐。孙家鼐(1827 - 1909),安徽寿县人,咸丰状元,曾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与翁同

① 冯桂芬:《采西学议》(1861年)。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895 - 896页。

黉同为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靠近光绪。孙家鼐受命为管学大臣后不久,即向光绪提出了筹办大学堂的具体计划,对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和增补。其主要内容为: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二,大学堂毕业生,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录用。“学政治者归吏部,学商务矿务者归户部,学法律者归刑部,学兵制者归兵部及水陆军营,学制造者归工部及各制局,学语言文字公法者归总理衙门及使馆参随,终身迁移,不出本衙门,俾所学与所用相符,冀收实效”;三,精简学科门类,加强专科的课程,取消兵学;四,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不得随意删节,译书局编纂各书,由管学大臣送光绪钦定,再行颁发,对“悖谬之书,严行禁止”;五,总教习可设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孙还提出“大学堂事当创始,拟派员赴日本游历,考察学务”。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许景澄、丁韪良为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浙江嘉兴人,同治进士,曾任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大臣,工骈文,对经世之学颇有研究。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1850年被派来中国,在宁波传教,后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翻译,1869 - 1894年,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许、丁两人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分管中学与西学。

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计原有房三百四十多间,并新建房一百三十多间。这就是以后的北大二院。同时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是后来的北大三院。1903年,京师大学堂还建立了医学馆。大学堂办学经费当时规定为白银三十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户部指定以

① 孙家鼐:《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大学堂关于颁布禁书书目的咨文》。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② 《大学堂关于派员赴日考学的咨文》(1898年7月)。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戊戌百日维新运动被镇压后,京师大学堂虽继续照办,但实际上一度陷于停滞。到 1898 年 11 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1899 年,学生虽有增加,也不到二百人。其时西太后又下令完全恢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学堂学生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取得举人、进士等头衔,获得做官的资格。因此,每到考期,大学堂学生便纷纷请假赴考。“维时各省学堂未立,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1900 年春,孙家鼐为反对西太后慈禧阴谋废黜光绪帝位,愤而辞职。许景澄以总教习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职权。同年夏天,义和团进入北京。随即八国联军也侵占了北京。“俄兵德兵先后来学堂占住,看守人役,力不能支,均已逃散,所有书籍、仪器、家具、案卷等项,一概无存,房屋亦被拆毁,情形甚重”。京师大学堂“学生均告假四散”。许景澄因呈请“裁撤大学堂”。8 月 3 日,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不久,许景澄也因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的政策而被慈禧处死。因而“大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

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人愤慨至极。因而 1901 年冬,“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清政府感到需要有一批既有文化科学知识、又能忠于封建王朝的知识分子为其服务,于是又宣布逐步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令各省举办学堂。1902 年 1 月 10 日,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① 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60 页。

② 《外务部咨文》(1902 年 1 月)。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③ 许景澄:《为拟请暂行裁撤大学堂折》(1900 年 6 月)。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张百熙(1847 - 1907),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的侍读。甲午战争时,曾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投降。戊戌政变时,因荐举康有为获罪,受革职留任处分。义和团运动后,张百熙积极“抗疏陈大计”,请清朝政府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主张变法自强。他受命管学大臣后,由礼部负责铸造“长三寸二分、阔二寸”之铜质钦差大臣关防一顆,关防文为“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发给张百熙持用。张百熙还是吏部尚书,负责全国官员的任免、升迁、调动等事,实际上他是一身而二任了。相当于现在中央教育部长、组织部长和劳动人事部长几重重要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张百熙的信任和对京师大学堂的重视。

张百熙受任后,很想有一番作为,把京师大学堂切实办好。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从前所办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未详备。……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他主持拟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和“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大学堂分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备科又分政、艺两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

① 《礼部给张百熙咨文》(1902年1月)。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② 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26页。

③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49页。

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举人出身。大学专门分科即本科,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学院,科下又分门目,相当于后来的系。当时规定分科大学共设七科三十五门:

(1)政治科,下分政治学、法律学二门。

(2)文学科,下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门。

(3)格致科,下分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门。

(4)农业科,下分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

(5)工艺科,下分土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等八门。

(6)商务科,下分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等六门。

(7)医术科,下分医学、药学二门。

大学专门分科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

此外,大学堂另设速成科,以期在培养人才方面,收得急效。速成科分为二馆:“一曰仕学馆,二曰师范馆。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速成科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

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10月14日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首先招考速成科学生。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以及外国文论等七门。现在北京大学档案室还存有京师大学堂各科考试题目,今试列举一二考题,以见当时考试程度之一般:

① 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第126页。

中国史学题：问汉武帝盛击匈奴，唐太宗厚遇突厥，御外之术固各有不同欤？试略言其得失。

舆地题：问同一纬度之地而气候寒暖不同其故安在？

算学题：声音每秒钟飞九十六丈，若隔四十二里一百二十丈远放炮，从看光到听声音该是若干时？

理化题：水不传热，而锅中煮水上下之温度相同，其故何欤？

政治题：不成文法与成文法有何异同之点？

交涉学题：拿破仑法典中之三大原则若何？试条举之。

国文题：子产论。

考场章程规定：“坐位排定，不得任意挪移，亦不得互相谈话，传递纸笔”，“犯者即时扶 [挾] 去”；“缮写不得草率，中国文及人伦道德二门，缮写尤宜工整，并以少涂改为宜”，等等。

考生成绩评定采百分制。“评定分数以百分为满格，通各科平均计算，每科得六十分者为及格，不及六十分者为不及格”。这可能是我国高等学校规定以 60 分为及格分来计算学生考试成绩的开始。

仕学馆考生由京师各衙门推荐，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即录取。师范馆考生除在京师由管学大臣主考录取外，剩下不足名额还可由各省选送，大省七名，中省五名，小省三名。年龄限定在三十岁以内。被选送的考生还要“开具三代籍贯年貌履历”，以备复试录取时之参考。辛亥革命后一度任北大校长的胡仁源，就是这次由

① 见蔡璐辑：《大学馆译学馆各项考试题目》。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② 见蔡璐辑：《大学馆译学馆各项考试题目》。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③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 年）。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59 页。

浙江选送、被录取在师范馆的考生之一。凡被选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发给去北京的川资和治装费。1902年,湖北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考生四人,共发给川资白银四百两,每人另发治装费白银五十两。

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举行比较正规的招生考试。考试结果,仕学馆录取新生36名,师范馆录取56名。11月25日,大学堂再次招生,仕学馆、师范馆又录取新生90名。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学。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就以12月17日这一天为校庆日。

为了办好京师大学堂,张百熙十分注意选用干部和教师。他认为“大学堂开办在即,经理一切需员”,“此次奉旨切实举办,自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要把那些“才具优长,通达时务”,“明练安详,学有根柢”的人员留在大学堂差委。张百熙尤为注意物色总教习的人选。他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经过多方了解和研究,他决定聘请时任冀州知州的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是清末散文家,桐城派的一个著名领袖。他在旧学方面很有根底,对新学洋务也较注意。张百熙称誉他:“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张百熙向清政府专折举

① 见《浙江咨送师范馆调取学生三代籍贯年貌册》和《浙江全省学政给张百熙咨文》,(1902年)。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② 见《湖北巡抚给张百熙咨文》,(1902年)。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③ 见《吏部知照大学堂咨文》,(1902年)。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④ 张百熙:《举大学堂总教习折》。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⑤ 张百熙:《举大学堂总教习折》。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荐吴汝纶为总教习,加五品卿衔,“汝纶力辞,百熙匍匐跪请”。吴允以“往日本访问学制,归以报命”。遂即去日本考察教育制度三个月。但旋因病于1903年去世。张百熙还聘请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琴南)为副总办;聘请辜鸿铭(鸿铭)为副总教习,孙诒让、蔡元培等为经史教习。还聘请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范源濂、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柏锐分别为日语、英语助教。此外,继续让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当时在大学堂的外籍西学教习还有:安修真、裴义理、西郡宗、吉得尔、满乐道、伯罗恩等人。英语教习秀耀春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动乱中被杀害,张百熙发给白银三千两,以示抚恤,这对外籍教师起了好的影响。但不久张百熙即把丁韪良等西文教习辞退,另聘日本学者服部卯之吉、岩谷孙藏、高桥作卫为教习。为了引进西学,张百熙还通过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采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课程章程书目以作为编订大学堂课程、教材的参考。1902年,大学堂设立藏书楼,除从国子监调拨各类书籍外,并由管学大臣咨文各省官书局,将已刻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十部或数部送京师大学堂,以充实藏书楼。当时各省官书局都积极支持,比如江苏书局一次送书一百七十种,每种四部,共计六百九十六部;广东广雅书局一次送书一百种,每种三部,共计三百部;湖南思贤书局一次送书五十九种,共计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传状》。

② 均为中文译名。见《丁韪良申呈》(1901年11月)。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③ 张百熙给外务部咨文,(抄件)。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④ 《钦差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咨呈》(1902年4月)。北京大学档案室藏。